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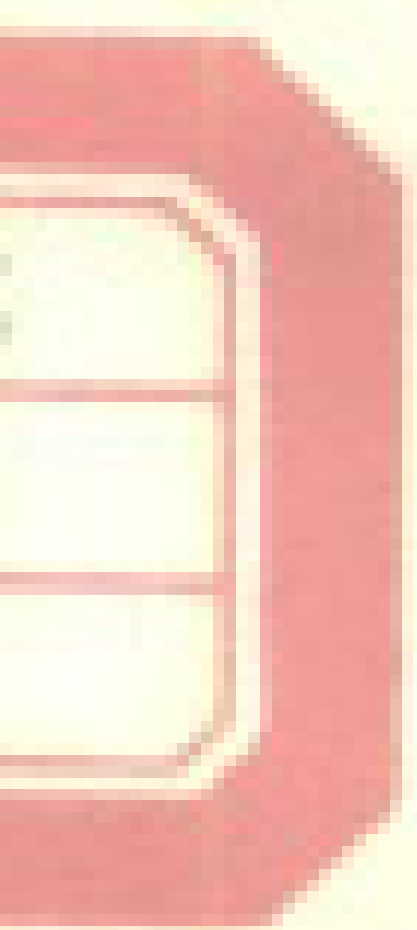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

耿昇 何高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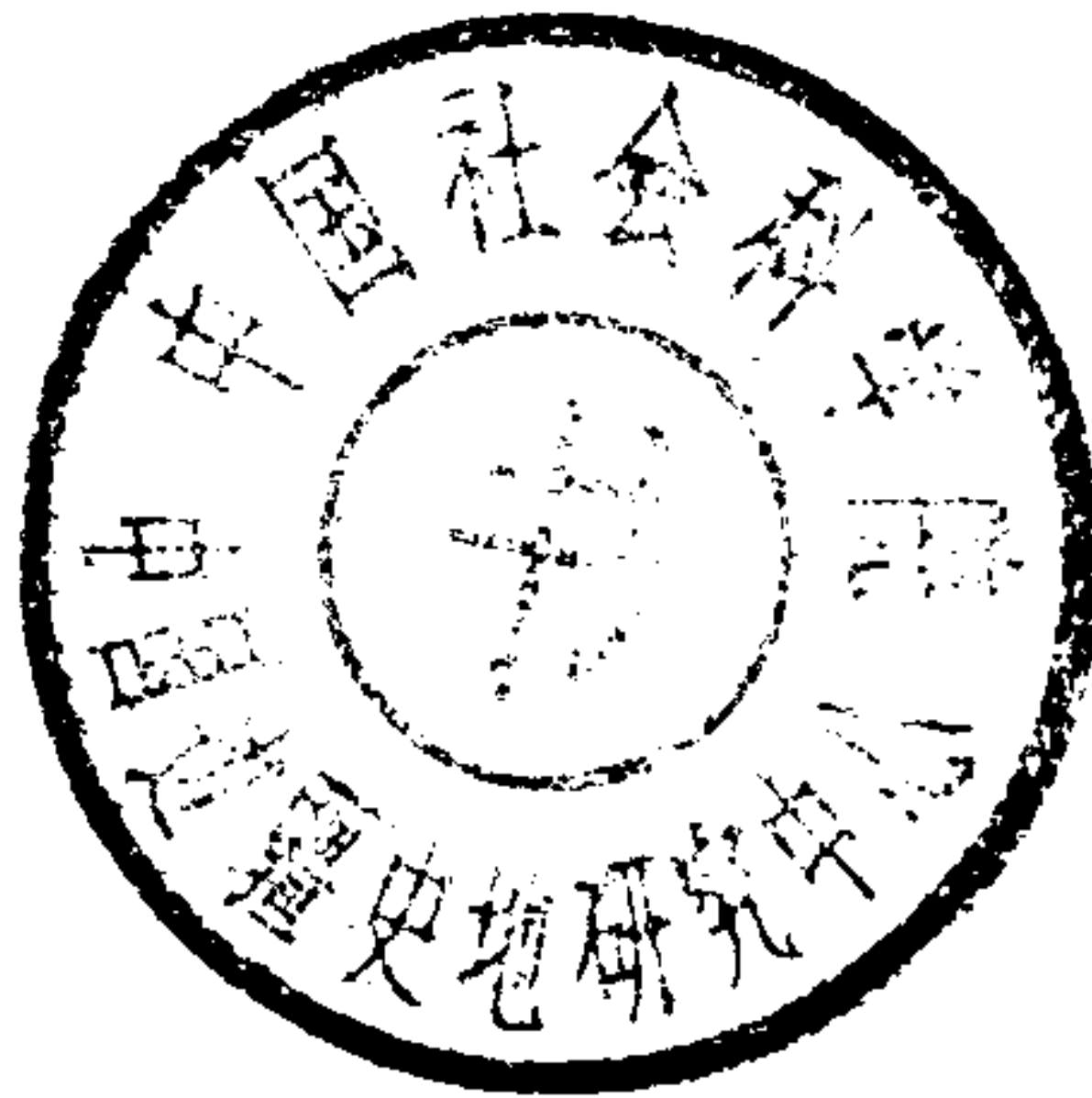


K919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

耿昇 何高济 译



1120

中华书局

1985年·北京

1187 67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

耿昇 何高济 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11 1/8印张·226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2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261 定价: 1.35元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5
前言	9
导论	11
序言	23
第一章:鞑靼人地区,其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	25
第二章:鞑靼地区的居民、服装、住宅、产业和婚姻	28
第三章:鞑靼人崇拜的神,他们认为是罪孽的事,占 卜术、涤除罪恶和殡葬仪礼等	31
第四章:鞑靼人的淳风和陋俗,处世之道和食物	39
第五章:鞑靼帝国及其诸王的起源,皇帝及其诸王的 权力	45
第六章:关于战争、军队的结构和武器,关于战争的 韬略和部队的集结,对战俘的残酷性,对堡寨的包 围和对于投降者的背信弃义	61
第七章:鞑靼人怎样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称, 对自己臣民的压迫,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	69
第八章:怎样同鞑靼人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 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对付他们的韬略,堡寨	

和城市的防御工事, 如何处置战俘	76
第九章: 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那些省份的 形势, 在那里会见过我们的证人, 鞑靼皇帝及其诸 王的宫廷	84
柏朗嘉宾旅程路线	110
注释	114
附录:	
波兰人班涅狄克脱对柏朗嘉宾出使的叙述	160
译名对照	166

总 目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1—175
鲁布鲁克东行记.....	177—348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译者序言

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是意大利人,出生于佩鲁贾(Péruugia,法文为Pérouse)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小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e)的挚友。在1245年之前就曾先后奉命前往德国和西班牙执行圣命。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根据里昂主教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他在高龄六十五岁时奉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之旨令,从法国里昂登程,出使蒙古。

柏朗嘉宾在两年半多的时间内从西欧到中亚,万里跋涉。他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后于8月24日抵达哈刺和林,有幸参加贵由皇帝登基大典。同年11月13日,他离开哈刺和林返国,于1247年5月9日再经拔都幕帐,最后于1247年11月24日返回里昂。他后来还曾作为教皇使节而出使法国。柏朗嘉宾于1252年卒于今南斯拉夫境内的达尔马蒂亚。

在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征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欧洲推进,曾一度挺进到波兰和匈牙利。西欧诸国对此惶惶不安,所以急欲刺探蒙古人的动向、军情、实力、作战韬略,制定抵御其进犯的良策。教皇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当然,教皇在委托柏朗嘉宾所携致蒙古人的信中也试图规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和接受洗礼,甚至还想

与之建立盟邦关系，但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柏朗嘉宾主要是以罗马教皇的“军事间谍”的身份出使蒙古的。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柏朗嘉宾向教廷所写的报告《蒙古史》中重点介绍了蒙古人所进行的战争、征服的地区、武器装备、如何对付蒙古人的入侵及其风俗习惯等等。因为柏朗嘉宾的出使比中世纪其他欧洲旅行家们东游的时间要早，如鲁布鲁克的出使是1253—1255年，马可波罗东游是1271—1295年，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东行是1318—1328(?)年。所以，柏朗嘉宾介绍的有关蒙古及中亚的许多情况是首次传入欧洲的。其行纪中所记载的资料至今仍是研究元蒙史和中国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但由于柏朗嘉宾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使罗马教廷深信蒙古人意欲西征，要求进行战备，并且呼吁先发制人地对蒙古人发动战争，所以他有意过分地渲染了蒙古人及其所征服的东方诸民族的残暴性和陋习等等，并极力进行歪曲和丑化。因此，书中的某些说法并不是真实的。

柏朗嘉宾东行的见闻录《蒙古史》一书在数世纪以来反复转抄、翻译和重版，先后出版了拉丁文、德文、英文、俄文和法文等等文本。我国学者过去也常有引用。1965年，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余大钧先生根据1957年苏联沙斯契娜(N·P·Shastina)夫人的俄译本译出此书，内部发表，这就大大地方便了中国学者。1965年，法国美洲和东方书店(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出版了贝凯(Dom Jean Becquet)和韩百诗(Louis Hambis)所译注的最新法文本：《柏朗嘉宾的〈蒙古史〉》。我就是根据这一版本而译出，但

按照中国学者的习惯而把书名译作《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本书的序言和注释系由韩百诗所作。韩百诗（1906—1978年）是伯希和的得意门生，著名的蒙古学和中亚学家。他曾先后担任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所长、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研究导师、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国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席、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所长、法国亚细亚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他的蒙古学和中亚学著作甚多，如与伯希和合译注的《圣武亲征录》、对《元史》卷107和108的译注、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关于中亚历史和文明的研究等。他尤为善于使用汉文、西文和中亚民族语言的各种史料，可以称得上为法国当代最有权威的蒙古和中亚学者之一。

柔克义（W.W. Rockhill）的《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注）中有由波兰人班涅狄克脱对柏朗嘉宾出使的叙述，现由何高济同志译出，附在本篇之末。书末原附索引，我们将它改作译名对照表。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蒋本良同志曾对译文作了校订，陆峻岭和何高济同志对译文也作了校阅，中华书局的编辑同志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表示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昇 1982年国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前 言

十三——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游记故事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对它们的翻译必须同时兼有两种才能，而这两种才能却又很少能汇聚于同一人之身：既要精通当时的拉丁文，又要熟悉行纪中所描述地区的历史和语言。实际上，各位游记作者都以不同的确切程度记载了他所听到的那些名词，无论是人名、地名，还是专用名词术语或者是动植物的通称。

《蒙古史》(L' Ystoria Mongalorum) 一书即属此类著作，所以贝凯(Dom Becguet)先生和我决定翻译此书，并附一些简单的说明性注释。我们二人各自都遇到了一些属于不同范畴的难题：柏朗嘉宾(Plan Carpin)游记原文有时晦涩难懂，尤其是在涉及到描述时更为如此，因为作者没有找到恰如其分的名词术语；其次是某些东方词汇的转写词有时又被出版者们所歪曲讹变，这些出版者们虽然是优秀的拉丁语学者，但在使用东方学规则方面则缺乏明确的概念，这也是在范登温加尔(Van den Wyngaert)神父版本中所出现的情况。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是在我们共同商榷之后，D. 贝凯才翻译出了其中的某些段落。因为对于那些语义不太清楚的拉丁文句子，必需译出一种与我们所了解的蒙古人的历史和习惯相吻合的意思来。至于笔者本人，我试图解释文中出现

的名词术语，范登温加尔神父有时根据不同段落而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译法。因此，我尽力使各种转写形式一致起来，同时也根据可能的原文名词选择最佳的转写形式，对伯希和(Paul Pelliot)曾讨论过的柏朗嘉宾游记中的某些词汇或术语，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我也使用了他所得出的成果；对于译注文其余内容，本人也试图采取同样的办法。

重新再版柏朗嘉宾游记时要求利用范登温加尔神父未能得到的两、三种手稿，并对充斥着错误的一些段落进行分析考证，以尽量恢复已失传的原文的本来面貌。因此，本再版译文要求进行大量的考订注释。

我们希望这种初次尝试能引起对其它一些具有同类内容和类似背景文献的译注问世。为了能够使读者们得到一些难以接触到的文献，这是唯一可以速成的方法。

韩百诗(Louis Hambis)

导 论

柏朗嘉宾及其著作

约翰·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于十三世纪末诞生于佩鲁贾(Pérouse,原意大利文为Perugia。——译者)地区,从1221年起,便受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派遣前往日耳曼,一直到1239年之前,他基本一直在那里行使萨克森修道院长及省教长的职务。其间唯有三年例外,因为他在此期间以同样的身份而侨居西班牙。在里昂主教会议作出决议之后,他又于1245年奉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之令而出使蒙古。

同年4月16日,柏朗嘉宾从该城(指里昂。——译者)启程,首先到达了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境内。——译者),在那里携波兰的班努瓦(Benoît)教友同行并充任自己的翻译。他们二人行至乞瓦(Kiev,基辅),于1246年2月3日再从那里出发而于同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拔都(Batu)幕帐中,拔都又把他们护送到了哈刺和林(Karakorum),因而得以在那里于8月24日参加贵由(Güyük)大汗的登基典礼。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两位教友便于11月13日离开哈刺和林,在1247年5月9日又重新抵达拔都幕帐中,接着又回到乞瓦。他们在后一个地方进行斡旋,以谈判当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联合。他们在归途中然后又经波兰、波希米亚(Bohè-

me)、日耳曼、比利时和香巴尼(Champagne, 法国境内。——译者),最后于1247年11月间返回里昂。

柏朗嘉宾还曾受遣出使法国国王圣·路易(Saint Louis),于1252年歿于达尔马提亚(Dalmatie, 今南斯拉夫境内。——译者),当时身居安蒂瓦利(Antivari)的大主教之荣职。

除了那本以《蒙古史》而著称的游记之外,柏朗嘉宾再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这次出使的正式目的就在于劝说蒙古人的君主接受洗礼和与基督教国家建立盟邦关系,但这一打算未能如愿以偿。教皇的使者还要打探蒙古人令人生畏的军事实力以及他们向基督教西方进犯的计划,这一部分使命完成得最为理想。

柏朗嘉宾教友身强力壮和具有知人之明,他懂得在自己个人的观察中再补充以他从在蒙古人中所遇到的基督徒口里获得的资料。自从他归来之后,他所介绍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这就促使他写了一篇有关基督教地区所面临的某些危险的简明报告。

作者在对该地区、居民及其风俗习惯进行描述之后,又介绍了蒙古人是如何以武器和韬略而相继征服了毗邻民族的。他还力图说明蒙古人正准备继续乘胜对外进行扩张。为了自卫,基督国王们应该联合起来,并且要向他们未来的侵略者们借鉴书中所详细描述战争方法。

柏朗嘉宾在其著作的初稿中还附加了最后一章,其目的是用以追述行程的各站并指出其见证人,从而为自己的叙说提供证据。实际上,他经常关心的是仅仅使用个人亲眼所见

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当后者表现得有点耸人听闻时，他又用“据传闻”来略作缓和。尽管书中的某些奇闻（如长狗头的人之类荒诞故事）是按照他那个时代所流传的形式载录的，但他有关蒙古人的第一部拉丁文著作于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手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第一代方济各会士竟丝毫没有以一位传教士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因为传教士一般最热心的是拯救人们的灵魂。但他却更为倾向于以一位特使的感情来叙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了一批有关人种学和军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着重研究了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活动，而又没有为读者们提供一些过分臃肿的教理评论，对于当地民族的瑕疵和美德，他都作了客观的评介，但对于他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则是审慎和颇有分寸的。

然而，还必须强调指出，柏朗嘉宾在最后一章中谈到自己本人及其沿途所受苦难的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例证才提及，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既对蒙古人的意图不抱幻想，也没有建议基督教徒们采纳蒙古人残酷的手段，如屠杀战俘（即便是在战争高潮中也罢）。

全书的笔调风格正如通过其提纲的清晰轮廓所洞察到的那样，全面呈现出了一位老于世故的教士所特有的那种笔锋，其目的仅在于通过一些深思熟虑的作法向他人通报情况并使人对此深信不已。例如，书中的每一章前面都附有一段详细内容的提要。如果说本书的作者也不由自主地引用了某些平庸的《圣经》节录或者表现了对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de Séville)的书生气十足的模糊回忆，那也是极其有限的，

刚刚是轻触一笔而已。他写得非常简练，以致于使许多人认为过分平淡无奇了，甚至有时候还忽略了一些可以明确表达其思想的语法修辞。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具体描述常常是模棱两可的，无论是对当地女子们的梳妆发型的描述，还是对蒙古兵士甲冑的记载，都一概如此，有时人们勉强才能看懂行文中究竟是指蒙古人还是指其敌手！

资料来源

柏朗嘉宾并没有直接清楚地提到那些使他得以写成《蒙古史》一书的报告的资料来源，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他搜集书中所载资料的社会背景。他的报告是以个人亲自的观察和从他在旅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基督教徒中搜集的资料为基础的，正如作者在其书序言的第三段中所指出的那样。

柏朗嘉宾书中某些段落可以使我们解释清楚其中的问题。我们发现，他利用在乞瓦与哈刺和林停留的机会，得以搜集到了大量有关蒙古人的情况，从而使他可以非常确切地介绍蒙古人历史及其风俗习惯的梗概。事实上，在其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提到，当他第一次在乞瓦停留时(IX, 2)，他记载了如下情况：“斡罗思(Russie，现译俄罗斯。——译者)的大公瓦西里(Wasili)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鞑靼人的情况”。稍后不远(IX, 5)，他同样还指出：“一旦抵达那里(乞瓦)，我们便前往向当地的千夫长和其他一些贵族请教我们前进的道路去了”。他可能获得了许多建议和情况，其中包括有关在前进时所遵循的路线、关于蒙古人对旅行家们的态度、居住在从第聂伯河到蒙古京都之间辽阔地区的各位蒙古封王的采邑情况，最后

是归附了蒙古人的各民族的资料。

但是，只是当他在和哈刺和林地区长时间居住期间才获得了最为丰富的资料。实际上，在同一章(IX,39)中，他还曾这样记载过：“我们发现……几位懂得拉丁语和法语的罗塞尼亚人(Ruthenes, 原指乌克兰人, 但是柏朗嘉宾一直用此名指斡罗思人。——译者)和匈牙利人, 罗塞尼亚的教士和鞑靼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 其中一部分人三十年来一直在进行征战或从事其它事业, 他们熟悉鞑靼这一民族的全部历史, 因为他们懂得鞑靼语, 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我们可以从他们之中知道有关蒙古人的一切。他们亲口向我们叙述了所有的事情, 有时甚至无须发问, 因为他们深知我们的意图”。当柏朗嘉宾谈到狗国的时候(V, 13), 我们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因为他指出: 据“罗塞尼亚神甫和其他人向我们证实的情况认为……”; 对于有关里海地区诸山脉和地下穴居民族(V, 15)的各种传说的情况亦然, 因为他还补充说: “据那里的人对我们所言……”, 也就是说当他在哈刺和林居住期间, 当地人可能告诉他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当他介绍有关独眼人的传说时(V, 33)所说的那样: 据与“皇帝生活在一起的皇宫深苑的罗塞尼亚神甫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可以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 他是在蒙古社会中的“西方”各界人士中搜集资料的, 也就是说向一些斯拉夫或途鲁吉(突厥)出身的人士询问打探, 因为在归附了蒙古人的欧洲地区中, 除了操斯拉夫语者之外, 在形成后来的金帐汗国(Horde d'or, 钦察汗国)、占据西西伯利亚和南西伯利亚的中亚诸邦以及今蒙古的西半部的各蒙古王公们的采邑中, 所使用

的则是各种突厥语,尤其是库蛮语,因为那里居住的大部分是途鲁吉人,也就是突厥人。

当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柏朗嘉宾在其文中使用的某些名词的书写形式之后,以上结论便会得到证实。书中所出现的大量名词大部分都是蒙古文,但转写的准确程度不同,其余的则说明它们是从操一种斯拉夫语或突厥语的居民口中搜集的。所以,他提到的后来蒙古皇帝蒙哥的名字时写作 Mengu,这是此名的突厥文书写形式,而不是其蒙古文形式 Mongka。这就说明向他提供资料的人是途鲁吉人,或者说他们是在途鲁吉社会中搜集的资料。当柏朗嘉宾提到那些负责征敛货币税或实物税的官员名字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他不以他们的蒙古文名字答鲁花(darugha)或答鲁花赤(darugatchi)相称,而为他们起了一个突厥文名称八思哈(basqaq,一般又都转写成 bascac)。其它一些名称,如朮赤(Tossu)或朮赤汗(Tossucan)、脱哈帖木耳(Tuhatemyr 或 Tuhatemur)、昔班(Siban 和 Syban)等等,这一切均说明为柏朗嘉宾提供情报的都是西途鲁吉人,很可能是库蛮人;或者是在他从操突厥语的人中搜集到上述资料之后,这些人为他进行了转写;另一例证是关于 Temer(帖木耳)一名,此人是陪同他的一位官员的库蛮语名字。相反,他把位于哈刺和林附近的皇家幕帐“失刺斡耳朵”写作 Syra ordo 和 Sira orda,这是对蒙古文 Sira > Shira, Shara 的很符合规则的转写,意为“黄色的”,然而再加上 ordo > orda,意为“驻地”,这肯定因为这是他在当地搜集到的一个蒙古文名词,而他所求助的中间人在蒙古社会中又没有能够把它变成他们的正确的表达形式。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另外，某些名词还说明柏朗嘉宾是在为他提供资料的斯拉夫族人中接受这些名词的，如其中的 *dochori* 一词便是由俄文 *d'khor* 讹变而来，意为“黄鼬”或“黄鼠狼”；为柏朗嘉宾提供资料的鞑罗思人错误地把 *tumen*（一万）一词误解作“黑暗”或“黑暗的”，这是因为他把蒙古文 *tümän*（一万）与俄文 *t'ma*（意为“黑暗的”和“一万”）相混淆了。同样，他所使用的 *Bati* 一词就是蒙文中的 *Batu*（拔都），也相当于俄文编年史中的 *Baty*；*Bisermini* 一词也别无它意，正是木速蛮（*Bursurman*），也就是穆斯林教徒（*Musulmans*）之名的众所周知的讹变形式，此词在俄文中很通用；同样，柏朗嘉宾把谷儿只人（*Géorgiens*，格鲁吉亚人）称作鞑别思人（*Obesi*），这里仅仅是对鞑罗思人对阿布哈思人（*Abkhazes*）的称呼 *Obezi* 的简单转写；他同样又把西途鲁吉人称为脱鲁黑人（*Torci*），这也就是俄国编年史中对古兹（*Ghouz*）或乌古兹（*Oghouz*）突厥人的写法：*Tork*。

在柏朗嘉宾大作之中，大量的人名、民族名称和地名的拼写法相当规则，使用了一种颇为统一的拼写方法。在这一整套名词中，斯拉夫语系名词数量很小，只出现了十几个；而突厥—蒙古文的名称则占大多数。我们还可以从中遇到一些从大盐池（*Aral*，咸海）到巴尔喀什湖之间广大地区的地名，数座城市的名称，如 *Barchin*（八儿真）、*Ianikint*（养吉干）、*Orpar*（鞑尔纳思）、*Omyl*（叶密立），除了鞑尔纳思之外，其余地名均已被考订清楚。唯有某些民族名称尚颇难稽考或解释，诸如火木黑（*Comici*）、合思（*Cassi*）、哈希（*Cathi*）、康里（*Kan-git*）、哈刺尼惕（*Karanit*）和哈纳纳（*Kanana*，疑为库蛮。——

译者)；至于某些人名，基本上都已为人所知了，除了某些商人或低级官吏名字例外；至于那些斡罗思王公的名字，例如圣托波尔克(Santopolc)、罗曼(Romain)和阿洛加(Olahaha)，通过俄罗斯编年史的分析便可以使我们对此进行考订。

如果对人名或地名的研究问题基本上已获得了大多是比较可靠的解决，那末由柏朗嘉宾所搜集的有关某些历史事实的资料所提出的问题则尚远未全部解决。例如，雅洛斯拉夫(Yaroslav)及其儿子们在蒙古的旅行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俄文编年史与柏朗嘉宾之所言不太相吻合，为了使这些表面上看来肯定是充满歧意的文献互相吻合，还需要从事一项棘手的考订工作。有关成吉思汗亲征的某些故事，柏朗嘉宾自己搜集到的传说，尤其是对他在哈刺和林居住期间，或者是有关他在东欧停留期间的情况所作的记载还都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手 稿

柏朗嘉宾《蒙古史》的第一稿手稿收藏在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的写本部中，即迪戈比(Digby)藏卷第1号(十四世纪)，属于同一种特藏中的同一时代的另外五种手稿分别保存在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和都灵。第二稿手稿收藏在剑桥大学的手稿部中，即基督教学院文集第181号(十三或十四世纪)，荷兰莱顿所藏的一卷十四世纪的手稿与它有密切联系，它为我们所提供的文本比十三世纪收入博韦的樊尚(Vincent)之《史鉴》(Speculum Historiale)中完整文本要好，甚至比我们在弗尔芬布特尔(Wolfenbüttel)的手稿〔后并编入

乌特尔克特(Utrecht)手稿]中发现的文本也要好。

版 本

柏朗嘉宾著作的第一个刊本被收编入了博韦的樊尚之《史鉴》初版中,于1473年在施特拉斯堡刊行,在1500年之前曾多次重版,尤其是在威尼斯重版。当哈克鲁特(Hakluyt)于1598年在伦敦单独刊行时,也是利用了《史鉴》中的文本。当比兹利(C·K·Beazley)于1903年在伦敦再次重版此书时,虽然仍使用了前一个版本,但却根据各种手稿作了进一步修订。

1838年,法国人达维札克(d'Avezac)刊布了该书的“完整”版本,分别使用了巴黎、莱顿和伦敦收藏的一些手稿,该版本于次年又转载于地理学会的丛刊之中。

1913年,普列(G·Pullé)又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一个颇为理想的版本;在时间上最晚和在质量上最佳的一个版本是由范登温加尔(Anastase Van den Wyngaert)神父所刊行,载《中国的方济各会士》第1卷,1929年佛罗伦萨版,第1—130页,参阅该书第577—578页。这最后一个版本的基础是剑桥大学所收藏的手稿,但在翻译中比普列的版本更为不严谨和过分自由,尤其是对于最后一章的原文使用了《史鉴》本。然而,范登温加尔神父没有使用俄国利沃夫(Lwow)所收藏的手稿[沃索林(Ossolineum)收藏品],该手稿提供了原书第一稿中的许多非常高明的写法。范登温加尔神父同样也没有使用卢森堡图书馆中所收藏的手稿(第110号,第175—187页),这一手稿虽然不包括最后一章,但却包括有在其它任何手稿

和版本中均未曾遇见过的一条简短注释。参阅《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57年10月号，第191—206页；西诺尔(D·Sinor)：《约翰·柏朗嘉宾关于蒙古人的报告，卢森堡所藏手稿的最新研究》。

译 本

除了《史鉴》中的各种译本之外，从1537年起，在威尼斯就出现了《蒙古史》一书的意大利译本，由安东尼奥(G·Antonio de Nicolini)所译，后来经常被人引用。哈克鲁特于1598年在其版本中又增加了一种英译本。比兹利的版本中同样也有另一种英译本，于1903年在伦敦刊行。

在法国，贝尔热隆(Bergeron)于1634年在巴黎根据哈克鲁特版本翻译出版了法文本，其中也使用了某些补充材料；这一译本又于1739年在海牙重版，它成了其它法译本的典范，一直到达维札克的考订文本问世为止。还应该指出，范德阿(Van der Aa)的荷兰文译本、根据贝尔热隆法文本而翻译的俄文本、根据各种英文本之一而翻译的德文版本等等。

最新的三种译本都附有学识渊博的注释，其一为G·普列根据他自己的版本而翻译的意大利文本：《小兄弟会会士柏朗嘉宾鞑靼行纪》(340页，8开本，1929年米兰版，载《阿尔卑斯丛书》)；其二为利斯(G·Risch)根据达维札克版本而翻译发表的德文本：《约翰·柏朗嘉宾》(8开本，共XVI+405页，1930年莱比锡版)；第三种是由沙斯契娜夫人(N·P·Shastina)所译之俄文本，与鲁布鲁克(Rubruck)游记合编在一起：《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共270页，1957年

莫斯科版)。

最近，方济各会史学家克莱芒·施密特(Clément Schmitt)神父再次推荐此书并译作法文：《蒙古史，英诺森四世派往鞑靼帝国的一位使节的调查报告(1245—1247年)》(8开本，共157页，1961年巴黎方济各会版)。这一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广义上翻译的，收编在《传播福音的冒险家》合集中了，其目的仅在于使柏朗嘉宾的游记故事更为通俗化，但它是根据范登温加尔版本所译的第一个译本，书末附有教皇与大汗互换的书札以及波兰人班努瓦的行纪。最后还应该提到一种英译本，载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之《出使蒙古，十三——十四世纪方济各会士有关蒙古和汉地的游记及其信札》，由斯坦布洛克(Stanbrook)修道院的一位女修士所译，1955年伦敦版。

本译本同样也是根据范登温加尔的考订本而翻译的，为了力图使本文尽可能准确一些，我们甚至还尊重原文的段落划分。然而，每当出现似乎应该离开原文而译的时候，我们都在每页下部以斜体字表示，在遇到需要对普列或利斯译文进行讨论时也这样作。我们的出版者不了解这些译文和注释就如这些作者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版本一样。对于那些纯属于史料性的注释，详见书末。

序 言

1, 本书是由小兄弟会会士、教廷派向鞑靼人及东方其他诸民族的使节约翰·柏朗嘉宾奉献于所有基督信徒们的, 祝他们在今世得到上帝的恩泽, 在来世得到荣耀, 能够取得对上帝和我主耶稣—基督的敌人的辉煌胜利。

2, 因为我们奉教廷之命即将出使鞑靼人〔1〕和东方诸民族, 我们领悟了教皇陛下和各位尊贵的红衣主教们的旨意, 于是便选择首先出使鞑靼人, 因为我们害怕即将有一种来自这一方向的危险威胁上帝的教会。尽管我们曾担心会被鞑靼人或其它民族的人所杀戮或终生成为他们的俘虏, 或者是会遇到饥饿、干渴、寒冷、暑热、受虐待和过度的劳累会使我们难以忍受。所有这一切果然大量地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除了死亡和永远被囚禁之外, 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 为了能够根据教皇陛下的命令而实现上帝的意志, 为了替基督徒效劳, 我们至少要真正洞察这些民族的意图和计划, 以将之揭示于基督教徒们, 为了不使前者的突然入侵会使后者象过去多次由于人类的罪孽而造成的那种处于措手不及的境地, 以及为了使基督教诸民族不会遭到大规模的杀戮, 我们就难以钟爱自身了。

3, 所以, 对于我们很谨慎地为了您们自身的利益而记录下的这一切, 您们应该深信不疑。更何况, 所有这些事物有的

是我们亲眼目睹，因为我们在他们之中和与他们一起旅行了一年又四个月的光阴，其间我们一直置身于他们之中；有的是由我们从他们之中那些作为俘虏的基督徒中所获悉，我们认为这些人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我们受教皇之命要仔细地研究所有事物和观察一切；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本人与波兰的班努瓦〔2〕教友共同执行这一圣命，他也是同一教会之成员，也是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旅伴和译员。

4，但是，如果为了通报读者，我们记载下了在您们地区前所未见的某些事物，祈望不要以此而称我们为江湖骗子，因为我们告诉您们的事物全是我们亲眼目睹，或者是由那些我们认为可信之士所证实了的情况。当然，如果因为好心不得好报，反遭人咒骂，那未免有些过分无情了！

第一章

鞑靼人地区，其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

1. 这里，我们意欲撰写一部鞑靼人的史著，为了使读者能够流畅地阅读，下面就是我们将要相继写作的内容：一，我们介绍那里的地区；二，讲那里的居民；三，叙说他们的仪礼；四，他们的风俗习惯；五，他们的帝国；六，他们所进行的战争；七，他们所征服并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地区；八，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最后讲我们的旅程，在皇帝的宫廷以及我们在鞑靼地区所遇到的见证人。

2. 对于他们的地区，我们打算循序渐进地论述如下：我们将首先讲它的方位，其次讲它的资源，最后再谈其气候。

3. 鞑靼地区位于东方一隅，我们认为那里正是东方偏北的地方。契丹人(Kitai)^{〔3〕}以及肃良合人(Solangi)^{〔4〕}地区均位于其东部，南部是萨拉森人(Sarrasins)^{〔5〕}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吾儿人(Huiur)^{〔6〕}疆域，西部是乃蛮人(Naiman)^{〔7〕}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抱。

4. 鞑靼人地区的部分地带是高山峻岭，山峦起伏，其余地带则是坦荡的平原，但几乎到处都遍布含砂量很大的砾石地。在该地区的某些地带覆盖有很稀疏的森林，其它地方则没有任何树木。那里所有的人，无论是皇帝、达官显贵还是其他人，都利用牛屎和马粪火来烹饪食物和围火堆而坐。另外，

可供生产使用的土地尚不足整个疆域的百分之一，即使在这一部分土地，若不以流水灌溉也不生长作物，但这里的水量和河流为数甚少，大江大河更为罕见。因此这里不但没有居民休养生息的聚落，甚至基本没有城市，只有一座人们认为还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名叫哈刺和林(Caracorum)^[8]。我们没有见到这座城市，但当我们到达失刺斡耳朵(Syra Ordo)^[9]时，曾涉步距那里只有半日行程的地方。失刺斡耳朵是他们皇帝的主要幕帐。尽管其余地方无法耕耘种植，但却适合饲养畜群，即使不是十分理想的话，至少也是相当适宜的。

5, 该地区的气候令人感到震惊的变化无常。实际上，在盛夏酷暑，当其它地区令人窒息的暑热袭人的时候，这里却会骤生狂风暴雨，雷电会使许多人死于非命，但同时也会下大量的雪。这里也会有强大的凛烈风暴，以至于难以骑马行进。所以，当我们到达斡耳朵(在蒙古人之中，人们把皇帝和显官达贵们的幕帐称为斡耳朵)前面不远时，由于大风暴的原因，我们被迫躺在地上，灰尘弥天，以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同样是在这一地区，冬季从来不会落雨，但夏季却经常下雨，雨量非常小，仅仅能够潮湿灰尘和滋润草根。同样，这里也经常下很坚硬的冰雹。所以，在推举皇帝和举行皇帝登基大典的时候，恰逢我们恭立于庭院中，下了一场大冰雹，正如我们后来所获悉的那样，由于冰雹的突然融化，使该宫廷中的一百六十多人都被淹没在冰雹融水之中，甚至许多物品及简陋住宅也都被水冲走。即使在夏季，这里天气也会突然间格外炎热，突然间又严寒袭人。到了隆冬，当在某一地方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时，其它地方的降雪量则又很少。

6, 总而言之, 作为对这一地区所作的一种结论, 可以说此地地域辽阔, 但另一方面, 根据我们用五个半月的时间而踏遍该地区并亲自进行观察之后, 那还应该说该地区贫脊到了难以用言辞表达的程度。

第二章

鞑靼地区的居民、服装、 住宅、产业和婚姻

1. 讲完了鞑靼人的地区之后,就要讲其居民了:一,我们将描述当地居民的形貌;二,阐述他们的婚姻;三,介绍他们的服装;四,论述他们的住宅;五,叙说他们的产业。

2. 当地居民的形貌与其他人的形貌大相径庭。事实上,鞑靼人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另外,与面颊相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脸上翻一直与眉毛相连结。一般来说,他们都身材苗条,只有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中等身材。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不会长胡须;然而,某些人在上嘴唇和颈部长有少量的须毛,注意保护而不肯剪掉。他们如同僧侣一样在头顶上戴一环状头饰,所有人在两耳之间都剃去三指之宽的一片地方,以使他们头顶上的环状顶饰得以相接。另外,所有人同样也都在前额剃去两指宽的地方。至于环状头饰与已剃去头发的这片头皮之间的头发,他们让它一直披到眉毛以下,把前额两侧的头发大部分剪去以使中间部分的头发更加伸长¹。其余的头发则如

¹ 利斯(见其书第55页)以一种他本人也认为无法理解的方式翻译了这句话,因为他没有理解原作者那稍有一点结构粗糙的句子。但他在注释中提出了两种具有一定可能性的解释,正如普列在其文第232页所指出的那样,第一种解释是很妥贴的。